

浙江文化丛书 ●

浙东学派研究

王凤贤 丁国顺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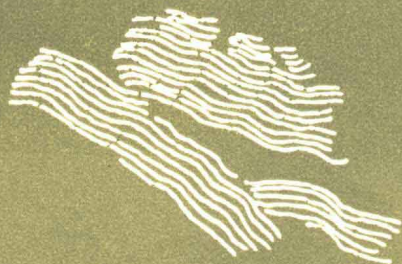


浙江文化丛书

浙东学派研究

王凤贤 丁国顺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浙〕新登字 1 号

封面题签 张岱年

责任编辑 何梦祥

封面设计 王义钢 郦文龙

浙东学派研究

王凤贤 丁国顺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 169 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 插页 2 字数 31.8 万 印数: 1-1270

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13-00907-9/G·209

定价: 9.00 元

出版者的话

历史上的浙江，文化昌盛，人才辈出。大概从宋以降直至近代，就被誉为文物之邦。探索浙江的文化渊源、文化发展规律，研究浙江在中华文明史上做出的建树，及在内外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等等，既是对中华文化整体研究的一个方面和深入；又是总结历史经验，可为发展文化提供借鉴；还可能起到增进振兴中华自信心的作用。这是我们出版“浙江文化丛书”的初衷。令人感奋的是这一想法很快获得省内外学术界的赞同。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杭大校长沈善洪，著名宋史专家徐规，历史学教授毛昭晰欣然允当顾问，省社科院编审、副院长魏桥力担主编的重任，王士伦、吴光、朱宏达、陆坚、郑云山、胡国枢、龚延明等学者应聘为编委。他们斟酌选题、组稿、审稿，花费了很大精力，才使本丛书得以陆续问世。在此谨致衷心的谢意，但如何编好这套丛书，尚需各界的关注。尤望国内外学者不吝指正。

浙江人民出版社

FG85/20

1979

《浙江文化丛书》序

夏 衍

远在五万年前，浙江就有“建德人”生活在这里，开辟草莱，揭开了浙江历史的序幕。浙江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非常丰富，尤其是余姚河姆渡文化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浙江也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摇篮之一。从古以来，两浙不仅山川秀丽，也是人文荟萃之地。不说远古，南北朝的沈约、谢灵运，到近代的龚自珍、王国维，现代的鲁迅、茅盾、郁达夫都是浙江人。当然也还有许许多多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前者从王充、陈亮、黄宗羲、朱舜水到蔡元培，后者可以从沈括、毕昇，一直数到当今的钱学森、钱三强，他们也都是浙江人。以上仅略举数人，浙江作为“文物之邦”，可见一斑。我作为浙江人，对此是常引以为自豪的。

现在我们正处在翻天覆地的大转折时期，新旧交替时期。在文化建设上比较突出的有一个创新和传统关系问题。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又有文字记载的几千年灿烂的文化传统。中国的小农经济和封建制度延续了几千年，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文化传统，既是珍贵的遗产，又是沉重的包袱，也就是文化传统中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对这个问题，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加以分析，区别对待。有人认为要创新就必须与传统一刀两断、彻底决裂，我看这个问题应该慎重讨论。五四时期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好像这个口号也是浙江人钱玄

同先生提出来的，这个口号很果断，也很彻底，但是缺乏具体分析，所以结果不仅没有打倒，反而因为树敌太多，引起了一股尊孔逆流。中国如此之大，历史如此之久，人口如此之多，像孔子那样的学说能够在这样一个国家延续两三千年的之久，假如它全是糟粕，没有一点精华，那是不可想象的，中国民族之所以能够以勤劳、勇敢、智慧自傲，看来儒学是起了一定作用的。所以我认为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文化不能一刀切，简单地予以全盘否定。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时期，要鼓励人们大胆地探索，勇敢地创新，对西方文化各种思潮、各种流派都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要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反对封建的、闭关自守的、宗法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传统，同时也要继承、吸收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有益的文化传统。

《浙江文化丛书》是本着这个精神编写出版的，因此我是很赞同的。

浙江在中国文化史上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不仅仅出过很多人才；陶瓷、丝织的发明在浙江；作为成熟的中国戏曲艺术也诞生于浙南的永嘉；古越的书院、出版和藏书都非常发达；至于学派，如浙东学派整整影响了有清一代。昔日浙江的文化如此昌盛，当非偶然现象，有它的发展规律，即自身的因素，也有外来因素的影响，为此，那是应该予以必要的探索，加以总结的。这对今天发展和繁荣文化教育、科学、艺术事业，以适应现代化建设需求，也是十分必要的。我相信素有“文物之邦”誉称的浙江，一定能发扬自己悠久的文化传统，培养出比以前更多的优秀人才，为振兴中华，建设经济富庶、文化昌盛的新浙江，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985年深秋

目 录

《浙江文化丛书》序	夏 衍 1
绪论——浙东学派的形成及其社会意义	1
浙东学派形成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	2
浙东学派的学术渊源	6
浙东学派的一般特点	14
浙东学术的社会意义	22
第一编 北宋——浙东学术的草昧时期	38
“明州杨杜五子”和“永嘉九先生”的学术思想	38
(一) “明州杨杜五子”的生平和思想	38
(二) “永嘉九先生”的生平事迹	41
(三) 周行己思想评述	46
(四) 许景衡思想评述	52
(五) 二刘思想评述	56
第二编 南宋——浙东诸学派的形成	65
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	66
(一) 吕学的渊源和特点	66
(二) 吕祖谦“道与心一”的哲学思想	70
(三) 吕祖谦“惠民图强”的政治思想	76
(四) 吕祖谦“以仁为体”的伦理思想	80
(五) 吕祖谦“明理求实”的教育思想	88

(六) 吕祖谦“文明向前”的历史观	92
(七) 吕学的影响和演变	97
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	105
(一) 叶适的生平和著述	105
(二) “永嘉学派”的形成	108
(三) 叶适的哲学思想与史学思想	118
(四) 叶适的政治思想与经济思想	126
(五) 叶适的伦理思想与教育思想	140
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	150
(一) 陈亮的生平事迹与学派属性	150
(二) 陈亮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	155
(三) 陈亮主“中兴”的政治、军事主张	158
(四) 陈亮的功利主义道德观	162
以“甬上四先生”为代表的四明学派	168
(一) 四先生的生平与学术渊源	168
(二) 杨简的“心”一元论	173
(三) 袁燮的政治伦理思想	183
(四) 舒璘的伦理思想和政治主张	191
(五) 沈焕学术思想简述	194
第三编 明代——浙东心学思潮的兴起	197
以王守仁为代表的姚江学派	198
(一) 王守仁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活动	198
(二) 王守仁“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宇宙观	206
(三) 王守仁“知行合一”的认识论	210
(四) 王守仁“致良知”的道德修养论	213
(五) 王守仁“五经亦史”、“随时变易”的文化史观	

.....	217
(六) 王守仁有“独到主张”的教育思想	219
从“浙中王门”看王学的分化	222
(一) 王畿的“四无”说和“良知现成”论	224
(二) 钱德洪的“习心”说和“功夫”论	227
(三) 黄绾的“艮止”说和他与王畿的“深辩”	231
(四) 张元忭的“悟修并进”说和他的“辟王畿”	234
以刘宗周为代表的蕺山学派	237
(一) 刘宗周的生平事迹与为学宗旨	237
(二) 刘宗周“气”一元论的宇宙观	242
(三) 刘宗周以“气质”为本的人性论	243
(四) 刘宗周以“意”为本的诚意说	248
(五) 刘宗周以“独”为体的慎独说	254
第四编 清代——浙东学派的全盛时期	260
清代浙东学派的主要代表黄宗羲	262
(一) 生平及著述	262
(二) “君害”论和“工商皆本”说	264
(三) “工夫所致即其本体”的哲学思想	275
(四) “无气外之理，生之谓性”的人性论	290
清代浙东学派中富于理论创见的陈确	296
(一) 生平和学术渊源	296
(二) “继善成性”的“性全”说	297
(三) “正心”与“务实”相统一的“知行”说	307
清代浙东学派的易学家黄宗炎	314
(一) 生平及著述	314
(二) “理象合一”的世界观	315
(三) 重在“践履”的认识论	317

(四) “生生无穷之善”的伦理观	323
(五) “权宜而得中”的历史观	326
自称“姚江末学”的邵廷采	329
(一) 生平及著述	329
(二) “虚心广见”的认识论	330
(三) “性”、“情”、“才”皆善的人性论	337
(四) “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	338
第五编 清代浙东史学与史家	343
浙东史学的基本理论和主要特征	343
(一) 以“经”为“史”的理论前提	343
(二) 浙东史学的三大特点	345
清代浙东史学的开创者黄宗羲	347
(一) “经世致用”思想的倡导和史学人才的培养	348
(二) 明史的研究	349
(三) 学术思想史的研究	354
明史专家万斯同	362
(一) 生平与著述	362
(二) “经世致用”“生之谓变”的史学思想	364
(三) 《明史稿》和《儒林宗派》	367
文献学大师全祖望	375
(一) 生平及著述	375
(二) “重在实践，不在词说”	376
(三) “旁罗博综”，“推原其故”，致力于文献整理	382
(四) 《宋元学案》的续补	388
史论大家章学诚	391
(一) 生平及著述	391

(二) 由“器”达“道”的哲学思想	393
(三) “持世而救偏”的史学宗旨	399
(四) “智以藏往，神以知来”的方法论	404
(五) 方志学理论的构建	416
史书纂修专家邵晋涵	424
(一) 生平与著述	424
(二) “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	425
(三) 有志重修《宋史》与辑校《旧五代史》	432
后记	435

绪 论

浙东学派的形成及其社会意义

素称“文物之邦”的浙江，不仅是我国古代越文化的发源地，而且到南宋时期，曾经成了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十六世纪前后，江浙一带又是资本主义萌芽发生较早的地区。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使浙江在我国文化和学术发展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东汉时期的杰出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就是浙江上虞人。宋明以后，浙江更是人才辈出，学派林立，学术思想异常繁荣活跃。“浙学”，便是当时的主要学术思想之一种。这种学术思想发端于北宋，那时就有“永嘉九先生”和“明州杨杜五子”从事教育和学术活动，被称为浙东“儒林之草昧”时期。到南宋，逐步形成了浙东各学派，其中有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杨简等“甬上四先生”为代表的四明学派，这是“浙东学派”的形成时期。“浙东学术”在其发端之初虽直接来源于二程洛学，但实际上学者们多宗孔孟，从北宋的周行己开始就具心学倾向；南宋吕祖谦的心学倾向更为明显，至于杨简等人更是当时心学的代表；明代中叶的王阳明集心学思想之大成，创立了心学思想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浙东学术”是宋明时期在浙东地区逐步发展起来的以心学为主要倾向的学术；“浙东学派”也就逐

步发展成为一个心学学派。所以，阳明心学的形成，可以说是“浙东学派”学术思想发展的成熟时期。从此以后，心学成为一股强劲的社会思潮，对后世有积极影响。刘宗周、黄宗羲等人既是王学积极因素的继承者，又是王学的修正者，最终形成了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清代“浙东学派”，他们在哲学思想、政治伦理思想和史学思想方面有许多新的贡献，是我国明清之际影响很大的一个反封建的启蒙学派。这是“浙东学派”发展的创新时期，也可说是“浙东学术”的黄金时代。“浙东学派”和“浙东学术”，在我国宋明清时期的思想文化史上占有主导地位。因此，深入研究“浙东学术”特别是心学的发展历史，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启示作用。

浙东学派形成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

在社会学说方面，一个学派的产生，往往是一种时代思潮的反映，归根到底，总是同当时社会存在的历史条件相联系的。同时，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里，历史上不少学派，都具有区域性的特点。考察“浙东学术”的发展和“浙东学派”的形成，我们就不能不注意这两个方面的情形。

首先，需要了解“浙东”优越的经济地域条件。关于浙东浙西之分，清代乾隆元年刊刻进呈的《浙江通志》卷一载：

元至正二十六年，置浙江等处行中书省，而两浙始以省称，领府九。明洪武九年，改浙江承宣布政使司。十五年割嘉兴、湖州二府属焉，领府十一。国朝因之，省会曰杭州，次嘉兴，次湖州，凡三府，在大江之右，是为浙西。次宁波，次绍兴、台州、金华、衢州、严州、温州、处州，凡八府，皆大江之左，是为浙东。

这里所说的“大江”，指的是钱塘江，即浙江的下游。“大江

之左”的“浙东”，即我们通常所称的“上八府”；而“大江之右”的“浙西”，即所谓“下三府”。至于“两浙”之称，起源很早，唐代就置浙江西道、东道；宋改称浙江西路、东路。浙东地区，山清水秀，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水运畅通，都邑盛丽。宁绍一带，更是“鱼米之乡”。尤其是宁波，内河与海运都很便利，经济也就比较发达。早在两汉、三国时期，宁波与海外已有交往，舟师出海，多从宁波出发。隋唐时期，明州（即宁波）与日本、朝鲜及南洋诸国，已建立了通商关系，成为对外通航的主要港口。宋元时期，明州（庆元）的海外交通进一步发展，曾设有管理外贸的专门机构。这些条件，都促使宁波的制造（特别是造船业）、贸易、交通、金融等等事业的发展。地处沿海的温州，早在春秋末期就受到越国先进生产技术的影响，到南宋时期，在兴修水利，改良农作物，推广柑桔良种以及造船、造纸、漆器、制瓷、酿酒、晒盐、采矿等方面都有很大发展，并成为对外贸易口岸之一，曾设有专管海外贸易的舶务机构。金华是浙东重镇，有丰富的农副业特产和精美的手工艺品，小商品经济较为发达，并有“小邹鲁”的美称。明代中叶以后，浙东地区就出现了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机户”和“包买商”。所以，浙东各地被称为“财赋之上腴”（嵇曾锡：《浙江通志》序）。

这种优越的经济地域条件，对于文化和学术思想的发展，当然是极为有利的。对于“浙东学术”的发展和“浙东学派”的形成，无疑是有重要影响的。何炳松在1932年所著的《浙东学派溯源》一书中，就主张给宋以来的浙江学术确定“一定的地点和名称”。他对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有时叫为“浙学”，有时又叫“婺学”，有时又称为“永嘉之学”，提出异议，认为“三个名词都不很恰当，因为前一个太泛，后二个太偏”。他赞

成“章学诚所定的‘浙东学术’”(《章氏遗书》卷二)四个字比较恰当”(见《浙东学派溯源》第188、189页)。这个定名适当与否的问题，关系到把这种学术思想的形成确定一个符合实际的地域概念的问题，也就是说，它是在“浙东”这个优越的经济地域环境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其次，需要认识“浙东”在文化学术史上的良好条件。浙东地区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绍兴（会稽）是春秋末期越国国都，古越文化是华夏文化中很有影响的一个重要源头。两宋数百年间，浙东各地学者辈出，讲学论道之风颇盛。正如全祖望所说：“吾乡自宋元以来，号为邹鲁。”（《鲒埼亭集》外编卷十六《槎湖书院记》）两宋以来，浙东地区永嘉、金华、宁波三地，学术活动特别活跃。

学术的繁荣，当然是以一定的社会经济生活条件为基础的。浙东地区比较充裕的经济生活条件，必然会促使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生活改善了，民“则知好学”（苏轼语），并以“不文为咎”，“不学为辱”（洪迈：《容斋随笔》卷五）。加上当时的地方官多重视教育，地方官学就蓬勃发展起来。浙江的州、县学就从北宋时的48所增加到南宋时的74所；据《宋元学案》一书所录，宋代浙江学者达527人，其中南宋学者比北宋增加四倍多。所以说：“宋之南也，浙东儒者极盛。”（《宋元学案》卷四九）当时的浙江成了全国学术思想最发达的地方，浙东学术的发展已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学派。

最后，需要剖析“浙东”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浙东学术”的发展和“浙东学派”的形成，不仅同浙东优越的经济地域条件和文化学术发展的悠久历史分不开，而且同浙东地区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有着直接的联系。

宋室南迁临安（杭州）以后，浙江成了全国政治的中心。

当时南北对峙，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南宋王朝，危机深重，这对浙江籍的知识分子是现实的考验，锻炼出了大批忧国忧民的爱国者，南宋的浙东学派代表人物吕祖谦、叶适、陈亮等人的政治思想都是直接为“恢复中原”的大业服务的。吕祖谦面对偏安一隅的南宋政局，常“念仇耻之未复，版图之未归”，提倡“勤政廉政”，“轻徭薄赋”，“更革弊政”，“惠民图强”，一再强调“恢复大事”，“方略当审”。叶适对“夷夏之辨”作了富有创见的阐述，肯定民族之间的关系应用“仪义答之”，但他明确指出：“今日存亡之势，在外而不在内”，对当时“主和”之议和秦桧所谓“南自南、北自北”之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为主战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

明清之际，全国范围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非常复杂，而这种斗争在浙东地区表现出特别尖锐的形势。在这种社会政治环境中，就产生了以黄宗羲为代表的、具有鲜明的反封建专制和反民族压迫性质的社会政治思想。梁启超在分析清代浙东学派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时，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指出：“满洲人的征服事业，初时像很容易，越下去越感困难。”“就文化中心之江浙等省，从清师渡江后，不断的反抗”，使清统治者感到“最难缠的是一班‘念书人’——尤其是少数有学问的学者。因为他们是民众的指导人，统治前途暗礁，都在他们身上。满洲政府用全副精神对付这问题，政策也因时因人而变”（《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第106—107页。下引该书只注页码）。又说：“那时满廷最痛恨的是江浙人。因为这地方是人文渊薮，舆论的发纵指示所在，‘反满洲’的精神到处横溢。”（第108页）

为了说明当时我国学术思想，特别是江浙一带学术思想发展的时代背景。他明确指出：“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朱彝

水，便是这时候代表人物。他们的学风，都在这种环境中间发生出来。”“他们对于明朝之亡，认为是学者社会的大耻辱大罪责，于是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他们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是为政治而做学问。他们许多人都是把一半生涯送在悲惨困苦的政治活动中，所做学问，原想用来做新政治建设的准备；到政治完全绝望，不得已才做学者生活。他们里头，因政治活动死去的人很多，剩下生存的也断断不肯和满洲人合作，宁可把梦想的‘经世致用之学’依旧托诸空言，但求改变学风以收将来的效果。”（第106页）总之，梁启超捉住了当时清代封建专制统治和民族压迫这一社会政治背景；同时又特别强调了江浙地区这种矛盾斗争的异常尖锐性和复杂性；进而分析了这种社会状况对于江浙一带学术思想发生、发展的直接影响，这就把清代浙东学派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说得相当透彻了。

浙东学派的学术渊源

上面已经讲到浙东学术思想的悠久历史，至于北宋以来“浙东学术”的渊源关系，历代学者有过分析，但说法不一。何炳松在《浙东学派溯源》一书中，以北宋永嘉诸学者接受过二程洛学为由，认定整个浙东学派的学术思想均渊源于二程，特别是小程子程颐。笔者系统研究了北宋以来“浙东学术”和“浙东学派”发展的历史，觉得何炳松先生只注意到了浙东早期学者师友关系这一点，而忽视了他们实际上多宗孔孟，以及后来的心学倾向这一主要事实。

所谓心学，实际上是关于人的主体精神的地位和作用的学说。从哲学思想的意义上说，心学家片面夸大主体精神的作用